在儿童节里反思成年人的责任

朱昌俊

在一个转型期社会，孩子恰恰是我们理解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判定发展底线的一个最基础指标，也是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一个最客观的视角。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属于所有儿童的节日，他们理应获得所有人的祝福：快乐、健康、平安。

在这一天的前后，很多学校为孩子举行了文艺汇演，不少家长也为孩子准备了礼物。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为孩子做了很多，却依然显得不够。轻松愉悦的节日氛围之下，关于孩子，仍有一些严肃的话题在这一天需要被重新打量，这是成年人应尽的责任。

“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是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现代社会，没有国家和个人会否认保护孩子的重要性，但孩子面临的伤害仍不可低估。2016年，我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犯罪案件达5335件，而这还不包括一些仍未被发觉和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儿童拐卖和性侵案件。此外，校园暴力、霸凌等现象，近年来也时有发生。如何从司法、教育、观念等多方面入手为孩子构建一个安全的社会网络，仍须继续破解。

网络时代，社会场景变化进入加速期。包括新技术应用在内的新事物，如何建立稳定的儿童伦理，越发成为现实之问。类似“小学生打赏主播4万元，环卫工母亲吓哭”的新闻一再出现，网络直播面向未成年人的陷阱，应尽快打上制度的补丁。过去我们担心电视会把孩子培育成“沙发土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如何让孩子与手机保持恰当的距离，父母又如何在玩手机与陪孩子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还有，无处不在的共享单车，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技术日新月异，未成年人如何“适应”，不容忽视。

当多数人都在关心儿童节应给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之时，别忘了，还有一些儿童可能仍生活在生活保障线之下，未能得到应有的儿童福利。他们或为留守，或随父母奔波于不同的城市之间，在受教育权、物质保障、亲情关怀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最大的希望，或只不过是拥有正常的家庭和学校生活——父母在身旁，自己不再留守。这方面，降低城市的融入门槛、教育精准扶贫，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希望。

正如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不平等，孩子的世界也同样如此。在今天，多数孩子的生活与权利得到很大改善的另一面，是一些孩子因为遭遇过度的物质满足，产生另一种“儿童问题”。当豪华跑车开进小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当孩子的生日会成了豪华嘉年华，部分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家长和成年人用来炫耀和攀比的工具。过度且不必要的物质赋予，能够给予孩子怎样的“三观”，引人深思。鲁迅先生曾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命题的探讨，其实并未结束。

今天我们的教育已从谋求硬件的改善，向追求包括教育理念在内的‘软件’的提升。这一背景下，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是否真的名副其实？教材是否真的科学？近年来有关于语文教材争议屡屡出现。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教材中还有多少经不起常识检验的课文，还有多少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史实，还有多少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悖逆现代观念的价值引导？

教育理应是一方净土，可这个领域并未成为腐败的例外。就在近日，广西玉林市检察机关查处多起教育系统经济犯罪案件，至少有四个县担任过教育局局长的官员被立案侦查。一个被腐败与权力勾结侵染的教育系统，能够输出怎样纯净的教育？

告别了三聚氰胺，孩子们的安全也很难说已经让人放心。随时能够吞噬生命的废井和不合格的栏杆还有多少？何时才能让孩子远离不干净的水与空气？

在一个转型期社会，孩子恰恰是我们理解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判定发展底线的一个最基础指标，也是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一个最客观的视角。孩子代表着未来，他们不应该遭到任何轻慢。在儿童节这一天，由孩子所面临的恐惧与伤害，反思我们身上的重负与责任，是比送礼物给孩子给重要的事。

冰点时评

尽快建立全国统筹机制 让养老金“钱跟人走”

周俊生

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允许养老金“钱跟人走”，让退休老人在居住地领取养老金，在现实条件下依然困难重重。

新一轮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的“重头戏”——养老保险综合改革方案的出台正越来越近，预计会在今年年内正式公布实施。据悉，这份已经酝酿了4年多的改革方案，将对关系到每位参保人切身利益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完善个人账户以及延迟退休等重要改革作出制度安排。（《第一财经日报》5月31日）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目标。在中国很多城市已经或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时刻，这项改革不仅关系到退出职场的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每一个城市家庭的幸福安康。4年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一直在推进，养老保险的持续性问题也日益突出，相关部门推出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也已实施，但在经济增速减缓后，为减轻企业负担，部分地方又推出了降低个人和企业养老金缴存额的决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加快步伐。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介绍，将要出台的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包括养老保险投资运营、提高退休年龄和降低社会保险费，这些内容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但是，原来各方期待的建立全国统筹养老机制未曾考虑，而是准备设立中央调剂金。这表明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允许养老金“钱跟人走”，让退休老人在居住地领取养老金，在现实条件下依然困难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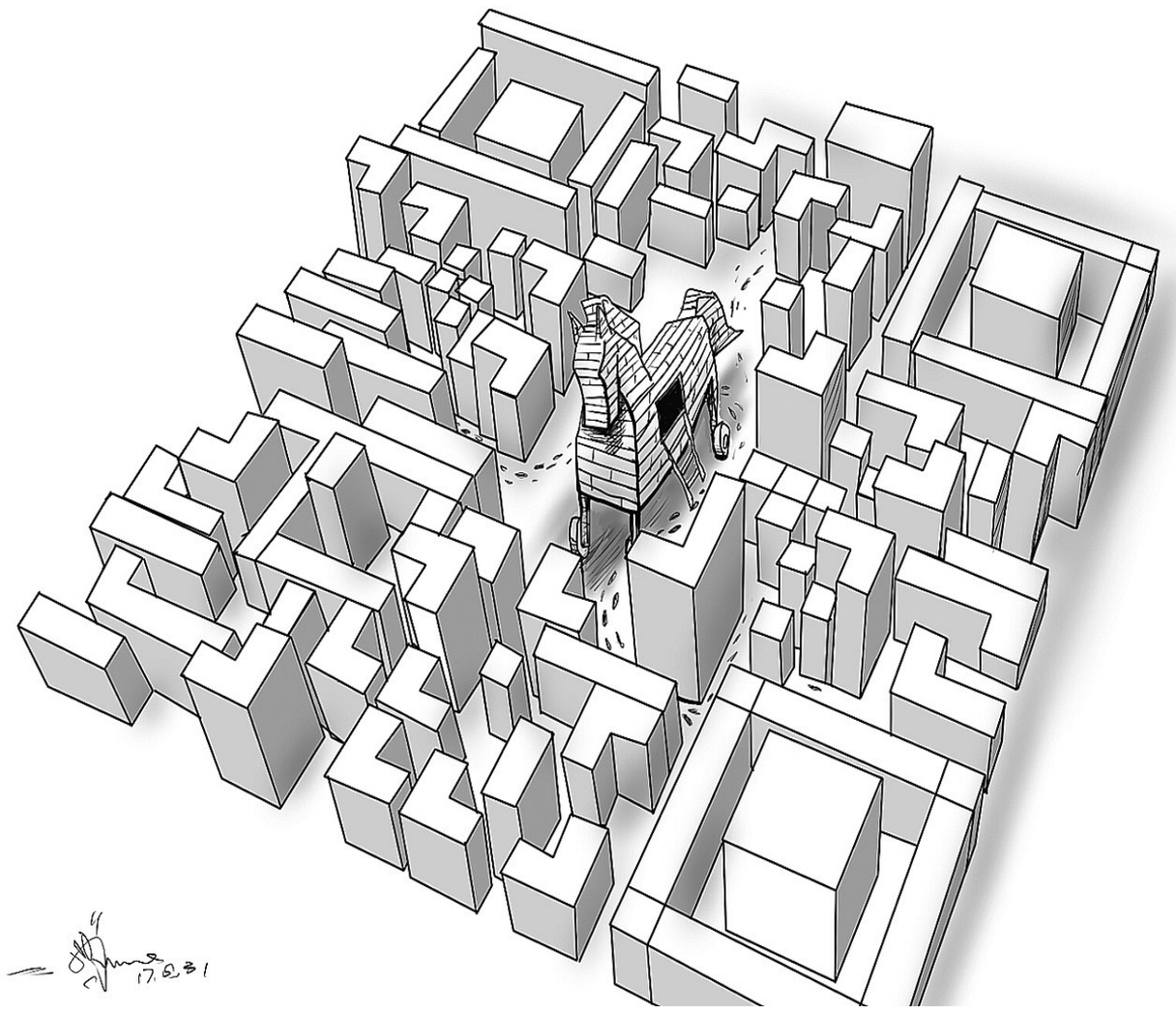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后，统筹层次基本以县市级为主，省一级的统筹层次，到目前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制度已经对养老制度的持续运行产生了障碍，一些地方养老金账户亏空就是在这种低层次统筹的基础上产生的。

市场经济建立以后，我国职工就业早已打破地域界限，特别是内地省份的农民工“孔雀东南飞”，纷纷在沿海省份打工，并且随着劳动制度的健全，大都与城镇职工一样，参加了就业地的养老保险。但是当他们退出就业回家乡养老的时候，按目前的制度只能领回其就业时自缴的部分养老金，企业为其缴存的养老金实际上进了就业地的养老基金，这使得他们回到居住地后难以享受到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养老待遇。

这也是造成目前一些省份养老金充裕，有余钱参与投资，而另一些省份养老金亏空，需要政府财政扶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机制，富裕地区的养老金及时调剂到亏空地区，养老金制度就能够保障到所有职工，异地就业的劳动者也就有了更高动力参与养老金的缴存。

目前，互联网已高度发达，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机制，在技术上并无太大的难度，关键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基于自己的利益，缺少动力。在已经披露的顶层设计方案中，准备建立中央调剂金，这当然是一种可以肯定的制度创新。虽然以前有的省份发生养老金亏空时，中央财政也支援，但大多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建立专门的基金，使亏空地区养老金的发放有了制度保障，无疑值得肯定。但从根本上说，中央调剂金毕竟也是由政府财政出资，加大了财政压力，而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制度，可以让现有的养老金发挥更充分的作用，也能起到减少财政在这方面支出的积极作用。

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制度，不仅有利于养老金的合理使用，还能够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向来有告老还乡的传统，但现在由于养老以及住房、医疗等的束缚，很多老人只能留在城市，加剧了城市的负担。因此，政府应该为有还乡意愿的城市老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如果说有些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机制，让养老金“钱跟人走”，已经有了实现的条件，这项改革应该尽快开始。



植 入 据记者观察，几乎所有的二维码生成软件、平台、程序都不会对生成的二维码进行审核。钓鱼网站、木马病毒也就很容易植入二维码。以应用程序为例，输入具体内容，点击“生成二维码”便获得了想要的二维码，全程可能一分钟都不到。（《法制日报》5月31日） 漫画：徐 简

“打车难”回潮，网约车该如何管理

朱达志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的重要载体，为它设置过高的门槛，就会消解新经济形态的巨大红利。基于信息技术之上的共享经济模式，所产出的巨大红利，本应惠及各方，实现多赢。

据《广州日报》报道，眼下网约车司机纷纷退出这个行业，“打车难”又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自交通运输部颁布网约车新政后，北上广深多地都相继发布了网约车管理细则，而这些细则基本上都对网约车平台的运营车辆和人员进行了严格规定。近期，大家都体验到“打车难”的回潮，路上的“网约车”数量锐减，约车时间变长，费用成倍上涨，不少市民只能回归传统的出行方式，搭进了过多的成本。

这样的体验，其实我也有过不止一次，以至于都想把打车软件卸载了。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公共交通建设总体落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当下，网约车的适时出现，既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城市建设之不足，又在相当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可谓善莫大焉。但是现在的状况，却令人始料未及。

对网约车的监管思路和某些具体做法，有必要适时作出调整。截至今年5月4日，广州共有网约车驾驶员网上预约报名4846人，经审核受理2184人，安排考试6978人次（包括未通过重考的），已核发驾驶员证1504张，通过率在21.5%左右。广州通过率仅两成，而深圳就更惨了，只有10%的司机能拿到资格证。在华东，虽然上海通过率超过四成，但宁波却不足两成。

这样看来，网约车司机纷纷退出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钱没有以前那么好挣了，收入锐减，只得挂靴而去；而是拿到那个资格证的门槛太高，望证兴叹，只能凄然而去。当然，收入大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因为平台补贴力度大，乘客也多，每月收入两三万元不成问题，现在却只有几千元。对那些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其他收入来源的人来说，几千元收入没法致富，聊以糊口却也绰绰有余；如果门槛不是太高，他们也不会轻易退出。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的重要载体，为它设置过高的门槛（包括对车和对人），就会消解新经济形态的巨大红利。城市公交系统压力加大、事实已经证明网约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出行难。基于信息技术之上的共享经济模式，所产出的巨大红利，本应惠及各方，实现多赢。

网约车是个新生事物，地方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出台监管细则，包括一些限制性措施，本无可厚非。而管理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一般而言也在所难免；关键是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适当修订政策，化解矛盾。

普职融通不只是赋予学生更多可能性

肖相客

在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宏观来看，职普严格的双轨制，已经影响到了现代人才的全面发展，导致了教育与人才结构的失衡。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根据2017年招生工作方案，从今年起，该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试点启动中职学校、优质高中联合办学。（《中国教育报》5月30日）

外界普遍将中职学校、优质高中联合办学的改革举措称之为普职融通。河南此番试点，主要是遴选一批有条件的中职学校与当地优质普通高中，联合举办综合高中试点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应该说，此举有利于打破目前的“一考定终身”现状，破除普高和中职的绝对界限，是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尊重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创举，促进了社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领域内的职普分离是各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遍现象。在过去，职普分离曾有利于加速工业化时期的技能传承和理论总结沉淀。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长期坚持教育系统严格实行着职普双轨制，这不仅阻碍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成为“二战”后英国国力逐渐被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超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宏观来看，职普严格的双轨制，已经影响现代人才的全面发展，导致教育与人才结构的失衡。

而在我国，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更需要切合当前实际，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首先，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和社会选人用人机制，在人们内心的深处植入“普职等值”的观念。

在常见观念里，人们之所以把普通教育看成是正规教育、精英教育，是改变个体命运、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就在于普通教育在自我实现、社会认可、未来发展空间和机会上仍然优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如果要占有同等的一席之地，还需要政策在引导合理报考、就业、招聘等方面加以倾斜。而目前，不少地方都将中职放在普高之后的批次录取，本就无形中迎合着社会的歧视观念。

另一方面，除了体制机制的改弦更张，推进普职融通还应该成为一种被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

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知识技能结构的要求，除了如河南一样，在中等教育阶段试行普职融通，在高等教育阶段，也该有相应的承接安排。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了突出社会问题，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显著，“有文化没技能”“有技能没文化”成了两个极端现象。这提示着我们，除了落实普职“双向互转流动”，实现学生的多元教育背景外，目前更为现实的，是在日常课堂实践中实现普职的知识与技能的联动对接，合理优化日常课程结构，本着对学子升学、就业、能力培养都负责的态度，根据社会需要和人才市场变化，完善我们的学校教育结构。

强制读经会 把我们的孩子带往何处

胡印斌

将国学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经由遴选与甄别，使之渗透进孩子们的世界中去。这或许是更为合适的教育方法。

小朋友同同（化名）13岁，只上过3年小学，却读了8年私塾。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却越来越反感读国学经典，迷上了航空科学，父亲却认为这样的人生格局太小了。目前，这场父与子的“战争”仍在僵持，何去何从尚不清晰。（《成都商报》5月31日）

孩子的世界是简单的，你营造什么样的氛围，他就会沉浸在什么样的氛围中。识字也好，读经也罢，都是孩子开始与这个世界缔结某种联系的渠道，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也不会有所抵触。然而，在生命的不断演进中，每一个生命个体却会自然生成某种兴趣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体的路径选择。一味灌输乃至强制，未免强加于人。

当然，我也相信，这位从事了10多年航空发动机工艺和设计工作的工程师父亲，转向国学经典，确实自有其独出机杼的心得，我们也尊重这样的转向。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把下一代也拖进来，并迫使其只能念私塾、读经典，完全与现实生活隔膜。

专注于私塾读经，想必是枯燥、刻板的。孩子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拥抱外部世界，通过他们童真的眼睛发现种种美好与趣味。经典是好东西，但却不是唯一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接续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但不能采取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方式。如果一个父亲强迫孩子放弃学校教育而去读经，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向的问题，而是涉嫌滥用监护权。

即便是以“为你好”“传承传统文化”的名义，也不能这样做。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之物，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意志，至少，也应该给孩子提供选择机会，而不是不容分说弄到私塾里去读经。况且，这种强制本身，也与经典的旨趣格格不入。孔子都知道“因材施教”，都强调学习的乐趣，而传统学人也往往通过驳难、讲道来吸引人，而非硬是把人逼上砧板。

老一辈人读私塾，不是下一代也要读私塾的理由；父亲喜欢国学，也不是儿子一定要放弃学校教育的依据。如果无视个人的权利，而总是以一己之得，甚或一己之私加诸孩子身上，无疑是一种专制。这样的专制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翻翻历史就可知道。同样，这也可能会养成某种“双重人格”，不可不慎。

当下的学校教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课业负担重、题海战术、人文教育缺失等，这些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但若就此将孩子引向读经的路，也不是一剂良方。不客气地说，与学校教育相比，现代私塾对小孩子而言可能意味着更深重的戕害。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试图以传统社会的礼仪王法规范孩子的行为， 岂非食古不化？

依笔者之见，合适的做法是，将国学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经由遴选与甄别，使之渗透孩子们的知识。这样一来，孩子们既能接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也能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碰撞的过程中发现传统之美，互为补益。实际上，关于读经种种，五四先贤已有痛切的批评，这一问题应该早有结论。不料在一个世纪之后又沉滓泛起，甚至每每搅扰了国人的心神，这也是现代公民不愿意看不到的。

降级干部去哪儿 不是秘密

陶 舜

不同的处分，是为了既不把犯错误的干部一棒子打死，也不人为减轻犯错干部应负的责任。

据中央纪委官网的消息，最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刘新齐，被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被降级甚至被“断崖式降级”的现象，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并不少见，有的降级力度非常大，比如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就被连降七级，从副省级降至科员。

据人民网2017年4月的数据，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20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降级。15人出自地方，3人出自国家部委，2人出自国有企业。在基层，被降级的干部可能更多。这些干部被降职以后，工作心态和工作成效如何，仍然值得关注。

降级干部去哪儿不应成为秘密，应该做好信息透明化工作。一是让公众客观实在地看到干部被降级以后的工作状态，看到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二是降级后的重新起用，尤其是拟再提拔的阶段，主动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

按规定，被降级干部的提拔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冻结，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我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都规定了降级的处分时限是24个月，两项法规均明确：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相比于免职，降级是更有力度的处分。媒体曾报道指出，全国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降级”能够更好地堵住“官复原职”的漏洞。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免职后起复的操作空间在于免掉的是职务，不是级别。保留原级别，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就为起复留下了伏笔。”不同的处分，是为了既不把犯错误的干部一棒子打死，也不减轻犯错干部应负的责任。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塑造了懒政典型孙连城的人物形象，这个光明区区长得过且过，对百姓疾苦无所用心，热衷于回家看星星。沙瑞金书记拍案而起：“这孙连城还有一点责任心吗？他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不是养猪场，不能养这种只会糟蹋老百姓粮食的懒猪。”后来孙连城就被断崖式降级，调往少年宫给青少年当校外辅导员。少年宫毕竟不是“问题干部”回收站，少年宫更需要积极有作为的好老师作表率，如果孙连诚继续“懒”下去，少年宫也不是他的庇护所。别让降级干部去哪儿成为秘密，搞好后续监督，既是对群众利益的保护，也是对干部最好的管理。